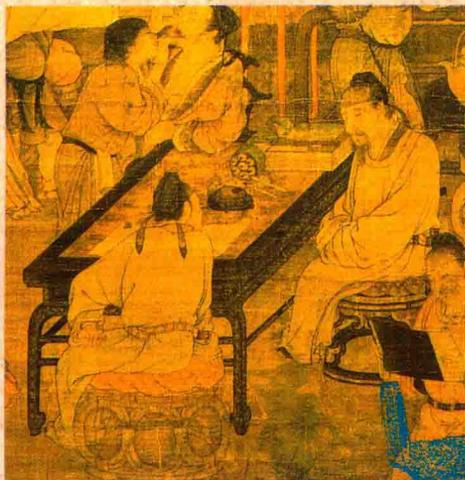


儒林選萃 5

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



黃奕珍 著



上庠博士·揚芬飛文
文津出版社印行



儒林選萃 5
黃奕珍 著

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

文津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 / 黃奕珍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1998[民87]
面 ; 公分. -- (博士文庫. 儒林選萃 ;

5)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500-1(平裝)

1. 中國詩 - 宋(960-1279) - 評論

821.85

87001876

博士文庫·儒林選萃

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

著作者：黃奕珍

發行人：邱家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初版：1998年4月一刷

印數：1000本

ISBN 957-668-500-1

新台幣 380 元

¥ 152.-

作者簡介

黃奕珍，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著有《李益及其詩研究——符號學式之詮釋》、《試論黃庭堅的「句中眼」》等。主要研究領域為唐宋詩及文學批評。

自序

轉眼間，寫成博士論文至今已匆匆三年，走在暮春的校園裡，杜鵑花早化為春泥，但高貴的印度黃檀正伸展著婀娜的枝條、流蘇也吐露著美麗的白穗，一如再一個三年以前，那時，剛擬好論文大綱，我的師父黃啓方教授坐在第九研究室裡細心與我討論，臉上掩不住的是一絲擔憂的愁色，我尷尬地看著自己寫的、粗略而滿載著徬徨與猶疑的大綱，心虛地瞄了師父好幾眼，最後，他說：「你做做看吧！」

隨後的日子我便在不斷地找資料、不斷地訂定寫作次序及一次又一次的撕毀與重擬大綱中度過，第一次寫作學術論文時這樣無依，及至開始動筆，又在節與節間匍匐前進、在章與章間遲滯徘徊、在宋初望不見宋室南渡、在渡江後好似又望不見宋末元初的方回，終點被無限延宕，這段期間，師父從未催促過我，只在我略有所進時為我高興、在我灰心喪志時為我打氣，如果沒有他的雍容與耐心，這本博士論文將永遠不可能以現在的面貌出版。

當然，我也記得在論文章稿初成時，師父一字一字仔細閱讀，據師母說整整花了一個禮拜，檢出好些錯誤及疏漏之處；另外爲了通過所裡初、複審的制度，論文也須再三修改，所有排版與印刷的工作皆由我先生獨力完成，他常在晚間下班後熬到清晨才把我交付的工作做好，隔了這麼幾年，希望白紙黑字的「謝謝」能表達一些當時在兵荒馬亂中未被訴說的心意。

另外，我也要感謝張高評教授的推薦與文津出版社主持人邱教授的玉成使得疏懶的我能如願將博士論文出版。

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 目錄

□ 001	□ 目 錄	
	自序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晚唐觀」的醞釀與形成：從五代到北宋中期	一三
	第一節 唐詩的圖象：「唐之晚年」與「唐之中葉」觀念的拈出	一五
	第二節 歐陽修等人對唐後期詩的詩論	三〇
	第三節 歐陽修等人對唐後期詩的學習與模倣	六七
	第四節 小結	一〇〇
	第三章 「晚唐」一詞的正式出現及意義的追尋	一〇三
	第一節 「晚唐」意義的潛行：蘇軾與黃庭堅的「晚唐觀」	一〇六
	第二節 「晚唐」意義的浮現：從蔡寬夫、吳可到陸游	一三二
	第三節 楊萬里：「晚唐」意義的新變	一五六
	第四節 小結	一七六
	第四章 「晚唐」詩風的實踐與變化	一八一

第一節	「江西詩派」與「晚唐詩」的糾結	一八一
第二節	重返「晚唐」的文學運動——葉適與四靈	一九七
第三節	「唐人」與「晚唐」的混淆	二一九
第四節	小結	二四一
第五章	「晚唐」意義的停格與「盛唐」的標舉	二四四
第一節	嚴羽的唐詩分期——對「晚唐」之淡化與替代	二四六
第二節	「盛唐」的提出與「晚唐」的隱退	二六二
第三節	「盛唐」的超越「晚唐」	二七一
第四節	小結	二八二
第六章	「晚唐」與「江西」意義的折衷	二八四
第一節	戴復古的「晚唐觀」	二八六
第二節	劉克莊的「晚唐觀」	二九八
第三節	「晚唐詩」的社會意義——「江湖」的沈淪	三一九
第四節	「江湖」的終點	三三三
第七章	方回（晚唐——江西——盛唐）論述網路的建立	三四一
第一節	方回的詩學版圖及其唐詩分期觀	三四二
第二節	一祖三宗的確立：「江西」與「盛唐」的疊近	三五四

第三節 「晚唐」界域的劃定	三八〇
第四節 「晚唐」與（「盛唐」、「江西」）的對立	三九八
第八章 結 論	四一七
附論：宋初有「晚唐體」之說的再商榷	四四三
參考書目	四六一

第一章 緒論

對一個修習中國文學的學生而言，「中國文學史」是一門非常重要的科目，在大學裡，它是必修課，入研究所，是必考科。我們對中國文學的認識及整體架構，可以說大部分來自這門科目的修習。不過，限於學力與時間，我們通常只注意並接受它說了什麼，卻很少探究過它爲什麼這麼說以及它如何說。

因爲對文學史有這樣的敬重，習慣上便對其傳達的訊息抱持著完全信服的態度，於是研究宋詩的人，在「文學史」上讀到了宋初流行三種詩體：白體、晚唐體、西崑體，並指出三體中的「晚唐體」是學郊、島的（有時也說學姚、賈），可是在後面的章節裡又說到南宋興起了學晚唐的四靈與江湖詩人，這時學的則是賈島、姚合及許渾。同是學晚唐，對象不同，「文學史」對其何以造成如此差異的原因並無解釋。似乎在文本的陳示中出現了推理的小小罅隙。再進一步來看，孟郊何時又爲何退場？許渾何時又爲何進場？也都成爲相關而於「文學史」中無解的問題。如果說文學模倣的對象決定模倣的原因及模倣者面對的個人及時代問題，那麼這個模倣對象的置換便不當等閒視之，Juril Tynjanov曾說：

文學史的延續可以看作是一個主因群（處於特定作品或特定階段的前景中的某一因素或因素組）被另一個主因群不斷取代的過程。被取代了的主因群並不從系統中全

然消失：它們退入背景中，日後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出現。（註一）

換句話說，我們不但要注意許渾的進場與孟郊的退場，還要追索孟郊退場後到那裏去，他原先所代表的晚唐意義在他退場後是否發生其他的變化？同時，仍留在其間的賈島在孟郊與許渾的進退中，是否代表了同樣的意義，都是值得再三思考的。換言之，某一界域中的人物之進出、增減或由中心至邊緣（或由邊緣至中心），不只是表面的移動而已，它其實標示了深層的變化，與整個文學思潮緊密連接，不可輕忽。但是，文學史，限於篇幅，可能也是限於寫作的視野與角度，並不能周全地提供類似的解答，而造成這個局面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讀者對此的「零要求」。

讓我們回顧中國文學的流程，在二千年的著作裡，沒有一部近似現今流行的「文學史」教本的著作出現，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傳統裡，「文學」在時間之流中所經歷的各種變化未曾被濃縮而以「史」的名字與面貌出現，一九〇四年我國才編就了第一部「文學史」，六年以後這部「文學史」才被出版，而且這還是根據日本人的教材所編寫的（註二）。「文學史」的編寫，相信是受到了西洋文學慣常以「史」之形式成書，或者是爲了在簡短有限的篇幅與授課時數中交代一個國家文學發展流變的狀態，這是給各種文學系的學生們研讀的。也因此，在著成「文學史」的過程裡，作者倉促地在數千年的資料之海中尋索所謂「文學史」的大脈絡並匆忙加以描繪、總結，他們以教導者自居，而讀者則是靜默的接受，在作者的文字與論述中細心整理、謹慎地揣測作者（或出題老師）的心意。這種閱讀，或者可以稱之爲教導式的閱讀、甚至可稱爲「扁平」的閱讀。

「文學史」字句中出現的罅隙，仔細看來，可謂處處可見。我們也許對這罅隙覺著了不安，因為它的出現威脅了原先對「文學史」的信任。然而，這正是另一種深度閱讀的開始。我們可以說，這處處存在著的、隨時可見的罅隙，正是「文學史」的組成本質。試想在幾十、幾百甚至上千的頁數中交代數千年的各種文學的樣貌，便如同用幾桶水來拌合幾噸土塊一般，其粗糙與生硬可想而知。當然除了篇幅的限制外，作者的觀點及寫作之時地對「文學史」之作爲一文本亦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些考慮讓我們可以更從容地面對「文學史」，知道它和其他的文本一般，有局限亦有優點。

也許我們可以就這篇論文有關的另一罅隙來印證這樣的思索方向：幾乎所有的「文學史」在處理唐詩時，皆用「四唐」之模式加以評寫，一般的說法是「四唐分期說始起於宋嚴羽《滄浪詩話》，奠定於元楊士弘《唐音》，完成於明高棅《唐詩品彙》，其後漸爲定論。」（註三）然而，四唐說何以始起於嚴羽，這樣一個聲勢浩大的批評模式何以崛起的原因卻未被討論。我們知道，「四唐」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批評模式，表面上看來，它用政治歷史的發展來對應陳述詩歌的發展，事實上它卻自有其內在的風格標準，而且從明代以後，這個模式不斷被加強，民國吳經熊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最輝煌的文學成就之一的唐詩時，便以此爲原型將書名取作「唐詩四季」，這是一個生動富吸引力的名字，但同時也正式成形了一個概念，那就是經歷長久的醞釀，唐詩不但被典範化，而且還被賦予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它一如自然，春夏秋冬，四季循環，永無止境，也許人世劫滅，而它依然運轉如故。中國文學中還未有任何一個時代的文體被如此論述與看待，沒有初宋、盛宋、中宋、晚宋（註四），也沒有初明、盛

明、中明與晚明，或是初清、盛清、中清及晚清，「四唐說」只用在唐代，只對應唐詩。這樣獨特而龐大的論述系統，應當經過深刻的反省與眾多的實際運作後才能形成，那麼，在高棅之前、或楊士弘之前，甚至在方回與嚴羽之前，這些反省與運作以何種面貌呈現？這個系統最起初的源頭在那裡？它何以發生並如何流到了嚴羽？它在宋人的思考中爲什麼這樣重要而得以形成一套含義豐沛、勢盛力強的詮釋系統？這些都是「文學史」尙未嘗試去探究的地方。追索四唐說的源頭正可以補足傳統古代文學史研究中對於「源流正變」的一貫要求（註五）。

也許，我們換一種態度來閱讀，便可以開始這樣的工作。首先，我們要知道，「文學史」是作者在特定的時空中寫作的，雖然有的展現了卓異的「洞見」，但也因此具有特定的「不見」（盲點），「文學史」呈現的是裂痕遍布的實體，這不足以讓人恥笑，而適足以顯示它的真實面像。靠著這些罅隙的存在展示，我們的閱讀將更豐富而有趣。如同Roland Barthes提出的「作者式文本」（writerly text）式的閱讀一樣（註六），我們可以不再在設定的閱讀成規中閱讀「文學史」，因著期待有所謂的最終正確的意義而縛手縛腳，我們也不需要仰頭聆聽他人的相關詮釋而以爲那是唯一的解答，相反地，鑽進「文學史」存在的罅隙，用自己的手腳與頭腦、用我們在文學系裡學來的種種本事重新填寫罅隙，持續創造新的意義與停留在不斷的詮解過程中，才是最大的快樂。

兩個罅隙，遠觀微細而曲折有致，如天青瓷上的細紋，是視覺上莫大的享受，然而一旦

縱身入內，卻似須彌大山，一望無際，這才發現原來在文學系裡學來的本事太少，簡直是寸步難行。我曾說過，這篇論文的一大目的，在疏通四唐說的源頭，說得更清楚一點，是尋找四唐最早出現的分期名稱——「晚唐」的崛起處並畫出其在宋代流變的樣貌。如果文學地圖一如地理地圖一般，可以尋得出源頭的話，最少我們也想像地輕估了尋源的困難，我曾看過記錄尋索黃河源頭的影片，片中說黃河的源頭到底當劃在那一條水道之下，至今學者仍為此爭吵不休，不要說流長似黃河，在小小的島上小小的台北流過故宮的雙溪的源頭便在陽明山的擎天崗上，兩座土丘夾著幾條彎彎拐拐的淺溝，時有耕牛在裡頭翻滾，泥漿爛黃，乾水時期，根本無法與「源頭」二字發生任何聯想。在實存的、可以面對著觀察的具體現象都可以產生這樣的困惑與疑懼，那在想像的、遙遠的、逝去多年的宋詩地表上，我們是否能尋出四唐說的源頭？（其實應當說尋出最初起的四唐說之名稱——「晚唐」的源頭？）

這一趟尋源之旅，或許可以開始於對「晚唐」此一名稱的字面解析：從字面上看，「晚唐」指的是唐代滅亡前的一段時期，這個時期為時多長則不可知，而且，這個名稱在我們的討論裡是以指涉某種特殊詩歌風格而存在的，因此它當內存於「晚唐」這個時段而在往後的歲月中被不斷地反省而使其質素益形清晰明確。換句話說，為求保險，源頭的辨識範圍應當由唐末開始，而在唐代代結束之後更加嚴密。而且就寫作此篇論文的初衷而言，主要在描繪楊士弘與高棅所提之「四唐說」之前——尤其是嚴羽之前，「晚唐」觀念的出現、發展與變化，因此也就暫以宋末元初的方回為此篇論文討論的下限，因為在嚴羽之前，「晚唐」之意涵已極豐富，但並未系統地置入一分期架構中予以討論，而在嚴羽之後，又端賴方回以眾多

的論述與具體的例舉呈現並建立「晚唐」於此分期架構中與「盛唐」的相應意義，此後，在確立「盛唐」與「晚唐」的豐富內涵後，四唐說的基礎才得穩固，而更進一步的架設也才能繼續完成。這一個區段也正是本篇論文的基本範圍。

指出：
探尋源頭及劃出上游的努力從另一角度來觀察亦具有極特殊之意義。當代學者韓經太曾

中國民族對詩歌藝術的關注，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首先，是以春秋稱《詩》為歷史現實基礎，而以漢儒「經世之學」為思想引導的社會道德之關注，由此引發了詩的社會教化意義；其次，是以魏晉南朝緣情體物之作為創作實踐基礎，而以玄學「言意之辨」為思維方式之自覺的藝術哲學的關注，由此引發出了詩作為語言藝術的本質性美學規定；最後，是以唐宋詩的高度成就為理論思考之前提，而以「唐宋詩之爭」為特定思考課題的歷史整合性關注，由此引發出了對中國詩歌之終極美學理想的建構意向。（註七）

「唐宋詩之爭」在這總結性的歸納中被看成是唐以後詩歌史最重要的論題，此處的「唐詩」，就一般的理解而言是指「盛唐詩」，亦即借重自然意象優勢，以表現積極進取的情感思想（註八），而「宋詩」的特質則是「發揮人文優勢，即通過人文意象的描寫與典故、議論的運用，以表現富於人文修養的情感思想」。（註九）但是為什麼與宋詩對舉的「唐詩」會由「盛唐」詩來代表而非「中唐」詩或「晚唐」詩甚至「初唐」詩呢？這樣以「盛唐」詩來概

括「唐詩」的作法又是否符合宋代詩歌發展的實情？由於對唐詩分期的源頭與上游以及整個宋代論唐詩的情況缺乏基本的釐清，使得類似的論述不斷地重複，而且幾乎在完全不自覺的情況下偏離了事實而犯了以後起觀念闡釋原始文學現象的錯誤。如果我們能把這一段有關唐詩分期及唐宋詩的黏連與對立的關係分理清楚，相信能更徹底地解決這些問題。

源頭的標定固然艱困，但從河川尋源的實際情形，也可領悟到為觀念尋源的一些基本認知。河源之起在匯聚成溝之前，是由眾山間無數的水分子慢慢地集合而成的，同樣的，對待觀念的形成也當有此一認識，是在廣闊的文學土壤之中，由社會眾人經過不斷的實踐與思考，觀念才能呈現為可以識別的面像，漸而發展與茁壯，所以在標識「晚唐」觀念的初現前，便當對當時及前此的文學社會作宏觀而細膩的考察，並對照以後的開展，來畫出其源流的輪廓。這便是本論文第二章的工作，在這個階段，歐陽修所論「唐之晚年」可以說是「晚唐」觀初現於末、可以識別的開始。然而，「晚唐」之河卻在歐陽修之後有一短暫的時間變成類似「伏流」的狀況，潛行地下、伏而不現，表面上看來似乎已失去蹤跡，其實在底下暗流洶湧，蘇東坡與黃庭堅對晚唐的論述恰恰表現了這個特質。「文學史」講宋人所論的「晚唐」，往往擇取劉克莊與方回的說法，認為宋初流行三體：晚唐體、白體、西崑體，此後便一跳跳到四靈之標舉「晚唐」（有時加上楊萬里對「晚唐」的討論），好像這期中並無相關的討論存在，這樣的陳述，在了解了「晚唐」之源流後，便很容易指出其中過於平面化與簡單化的瑕疵。宋初的確有自覺性地學習白居易與李義山詩的詩人，但文獻所見，並未有自覺性地學習所謂「晚唐」詩的詩人，劉克莊與方回的說法，應當透過解析他們自身的晚唐觀來探究此一言說

的建立及其意義，而非引人所言、遽下結論，以為宋初果真有為詩人所自覺學習的「晚唐詩派」。而且，將此後直到四靈間對晚唐的討論予以完全的空白，一方面是忽略了文學資料所呈顯的事實（此時除了蘇、黃外，尚有吳可、陸游等的論述），另一方面則被迫面對一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如果，這一段真的是「空白」，那麼何以自黃庭堅後如日中天、蓬勃發展，成為詩學主流的江西詩派，會突然之間受到卑微隱晦的「晚唐」威脅而步履踉蹌？如若觀察「晚唐」的流線，則可以發現自歐陽修之後，「晚唐」不但以內存於詩之創作的面相存在，同時也普存於社會大眾，形成一種共識，在這種認知下，蘇、黃吉光片羽式的討論才能被理解，而繼起的討論也才能與四靈等的提倡相連接，使「晚唐」在南宋的崛起，不致成為一隨機的盛放，而實在是受到了文學演進規律的嚴格圈範。

在這段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認識到，正如河水來自沿線各個流域的眾多水多子，觀念的演進與開展也如此，所以必須要在各個時段中尋找任何相關的論題，並將其結串闡析，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研究者在此一理論基礎下，應當遍查現存的宋人書籍，因為，觀念散落在所有當時的言說中，可以被特殊對待、可以作為整個言說系統的一環不被意識到而普遍使用，大體來說，當以後者所占比例較大。然而，限於時間及精力，這個研究者只檢閱了宋代的詩話、主要詩人的集子以及今人編錄的一些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並按圖索驥回到原典翻尋，這裡，理論與現實的裂縫間翻出了一種難，如果，我們真可以翻遍所有的文獻，是否可以真的精確地描繪出「晚唐」變化的圖樣？在材料與闡釋中間，應當並非如此透明而無危險。舉例來說，從翻檢材料開始，我們篩選材料的標準從來都不可能首尾一致，因此在這個層面上，

我們的詮釋也就只能是對理想中正確的「晚唐」面貌盡力的驅近。再者，如果我們無法檢出所有的有關資料，那麼，我們勉力挑出的也許百分之六十、七十甚或八十的材料是否足以支持我們作一大致合理的論斷？有沒有很重要的一句話、一段文字，標示著「晚唐」觀念的突然轉進或分叉，是我們在尋閱資料時漏掉的，或者，根本沒有找到過它？如果這種情形發生了，是否一切的努力便因這一隙漏而失去它存在的價值？於是幾年的光陰，僅僅用來成全一次錯誤。這種恐懼與小心在寫作這篇論文的每一章時，都如生地矗立目前，然而它隨即被以下的思緒淹過，正如現代西方文學批評所宣示的「作者已死」一般，沒有辦法認定文本的閱讀或詮釋指向一最終的、正確的、統一的意義，這種意義並不存在，也就是說，客觀上並無此一意義，然而主觀上、作為一個作者與讀者，這種意義是不斷被創造而因此賦予生命的。對於我個人，因為覺著文學史上許多觀念已被平板化，文學史呈現的斑斑裂痕讓我想把它們重新立體化、生動化，並予以填補，所以才有這樣的寫作產生，同時我以為所有觀念的生成背後都有一個豐富多變的故事，我們必須把它重說一次，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選擇文學研究作為一生的事。然而重說的這一遍，不必要是絕對正確而不可更改的典範，它只是提供一種看法，跟習以為常的不同。但是這個想法也僅能至此而止，不能更向前，到達唯我之詮釋獨尊或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境地，因為儘管評論者「需要經由解構的管道而達成『再構設』」（註一〇），卻「必須精確地掌握語言記號之辨證性」（註一一），在書寫評論之時，也正是展現其獨創性與洞察力之時，我們心中自當有此警惕。

將觀念對照河流所得的另一啓迪是，不管這個觀念的字面所指架設在那一個時代那一群